

论第三世界现代化多元道路及其成因

李 继 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60年代以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随着政治上的独立而相继进入独立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运动。文章对在这一运动中出现的多元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归纳和说明,进而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内部条件以及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形态的演进等三个方面解释了这种多元化的成因并确认了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合理性。

作者:李继东,男,1958年生,湘潭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

一、多元化的发展方式

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表明:19世纪还只有资本主义发展方式,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式,20世纪下半叶后,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现代化道路则出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出现了不同生产方式结合的新现象。从现有情况来看,第三世界现代化道路或者说发展方式大致有以下五大类型。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仍然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仍以私有制、市场机制为主动动力,结合一定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对西方的全面开放,引进国际资本,输入先进科技,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批国家成为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NIC)”。其原因或是一些国家原有生产方式内部的各种机制基本上具备随着与资本主义发展而同步瓦解的特点,或是一些国家与地区在外力的强制改造、推动、扶植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类国家在拉美有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在亚洲有南朝鲜、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在北非有埃及等。

2.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则超越了资本主义,选择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轴心的发展方式。其基本的原因或是旧社会内在机制的坚固性使资本主义受阻,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国;或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与影响,而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亚洲有越南、朝鲜等,在拉美地区,古巴独秀一枝,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执政时也曾实施过“社会主义”的改革,在70年代的黑非洲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刚果、贝宁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都曾选择过“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

3. 混合生产方式。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结合的共生形态。在第三世界,这两种生产方式结合的新现象日益明显。早在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提出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和政策的某些方面兼收并蓄的思想。他主张一方面实现主要工业国有化和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农民合作社;另一方面保存私有制。^①尼赫鲁的上述思想,自70—80年代后

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所进一步付诸实践，一方面不放弃他们认为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掌握经济命脉的国有制，另一方面提倡私有经济，甚至将一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这种趋势在非洲已成为一种大陆性现象。非洲自本世纪60年代独立后，曾受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示范以及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说的影响，认为采用中央计划经济比无计划的市场机制更为有效，过度强调国营企业的地位与作用。那些以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的国家还认为私人企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剥削现象，因而私营企业在这些国家受到限制甚至被取缔。随着非洲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道路，许多国家因此转而采取扶植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如科特迪瓦、加纳、塞内加尔、加蓬、多哥和几内亚等。

4. 殖民地生产方式。仍然有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此种生产方式中徘徊发展。殖民地生产方式是传统封建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混合生长和变异的过渡性生产方式。^②其特征如下：(1)边缘社会地区内部经济相互脱节，而这些脱节部分与核心国家联系在一起，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所支配；(2)边缘社会农业经济中产生的剩余(以及在边缘国家产生出来的剩余)大部分都以各种方式流向核心国家，投入资本国际积累；(3)边缘社会形成了在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控制下的大批贫乏的小土地所有者，其简单商品生产纳入资本与市场关系中。(4)在政治关系上，寄生地主和商人资产阶级成为国家政权的支配力量。边缘社会不存在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明显冲突，也不存在农业工人阶级与其它处于从属地位各阶级如佃农、中农的冲突。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奴隶制、分成制、租佃制、契约劳工制和债务农奴制嫁接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而混合生长。属于这类发展方式的国家曾包括工业化前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泰国、埃及以及现存于黑非洲、南亚与中美洲地区一些经济极不发达、传统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其国内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在巴西、印度的一些地区这种殖民地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

5. 伊斯兰发展方式。其实质是基于伊斯兰历史文化遗产、企图超越西方现代化经典道路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小生产者发展方式。霍梅尼曾明确表示其特征是：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伊朗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使其理论化为现实，成为这一独特发展道路的典型。这一发展方式企图在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伊斯兰尊重个人所有制，但这要在限度以内。所以它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又在三方面和资本主义不同：(1)它同财富积累和将财富抓在自己手中的少数人作斗争；(2)伊斯兰法律保护国家和个人资金；(3)施舍是崇拜真主的一部分。”^③伊斯兰发展方式在经济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种不多也不少的小生产者思想。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典型的伊斯兰发展道路在第三世界可说独树一帜，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倒退性，它中断了伊朗的“白色革命”。此前，巴列维王朝6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把伊朗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占优势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依靠新的、基础还不稳定的工业结构支撑的大型城市化国家，削弱和捣毁了社会的传统阶级并创建了新的社会阶级。伊斯兰发展方式以道德伦理为本位、回归传统、拘守经典、维护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等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伊斯兰发展方式的选择也是西化在伊斯兰世界破产失败的必然产物，它具有反对西方经济殖民主义和文化

①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译本)，第693页，《尼赫鲁言论集》第3卷，新德里1954年版，第12页。

② 殖民地生产方式概念见印度学者哈姆扎·阿拉维·帕特奈克著作，参阅《南亚译丛》1987年第1期。

③ A·P·塔巴拉赫：《伊斯兰精神》，贝鲁特1978年版，第293页。

帝国主义、要求自主独立的积极一面。正如霍梅尼所谴责的，“白色革命”犯有三大罪行：“破坏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珍宝；强制人民接受殖民主义的陋习败俗；挥霍人民的财富喂肥残忍的王室商业。”^①正是“白色革命”的这三大灾难，导致了伊斯兰共和国的产生和伊斯兰发展方式的探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方式的出现与探索，其实质和意义很类似吉奥丁·萨达尔（Ziaadchin Sardar）的设想：以“净化”增长打破常规的“发展”战略理论，即以伊斯兰社会的价值为元点，实行稳定、优化、有选择的增长，建立社会稳固的维持系统、保障系统、政治环境及经济环境。^②

第三世界晚近现代化运动不仅在道路上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且在模式上比之早期现代化国家更显得丰富多彩，出现了众多的类型与变型。从政治发展模式看，就曾有西方民主型（印度、墨西哥等）；军人集权型（巴西、南朝鲜、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君主白色革命型（巴列维王朝时代的伊朗、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激进革命型（中国、古巴等）；伊斯兰社会主义型（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其政治体制包括君主制、寡头制、独裁制、议会制、联邦制、共和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等。从经济发展类型看，有进口替代型、有出口导向型、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型和优先发展轻工业型等。从文化发展模式看也呈多样化：在拉美地区有土著主义，它主张重新宏扬印第安人文化和传统，强调把印第安人文化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班牙的形式综合成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儒家资本主义；在中东地区有伊斯兰改革主义，它是伊斯兰文化圈改革派试图协调伊斯兰文化与工业文明关系，重新审视、反省、转化自身宗教文化，走出文化困境的可贵探索；在黑非洲则有“黑人传统精神”，这一思潮着重突出黑人文明如诗歌、音乐、艺术、舞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意欲复兴非洲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既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又实现“文化融合”。

二、多元化发展方式的成因

1. 迟发展效应所致

这是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历史背景而言。这种迟发展效应突出表现在如下几点。

1) 导致欧美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对多数晚近现代化国家来说，已不复存在。早期现代化的实现是以经济和非经济手段掠取当时世界无限丰富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为前提的，其能实行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③以率先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英国为例，它的经济与众不同，即是因为它大大领先其他国家获取丰富的人力与自然资源，而成为“第一颗长出腿的蛙卵，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久，该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的一段话就很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宣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

① H·努其鲍默：《霍梅尼》（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② 参阅王志刚：《简评〈伊斯兰未来〉》，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海沿岸是我们的林场；在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是我们的牧牛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源源流进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我们的咖啡、糖果和调料的种植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是我们的果园；我们在美国南部的大片棉田现在扩大到了地球上所有气候温和的地区。”^①与英国一起较早进入工业化的法国、美国等也多少占了这种率先发展所产生的种种优势。19世纪中叶，稍后兴起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日本等，借助于以下三种手段仍有足够力量实现资本积累独立完成了工业化：一是对外贸易迅速专业化，大量出口在世界市场有比较利益的产品，如俄国的石油、日本的生丝；二是求助于国家政权力量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使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加强对国外商品的竞争能力；三是以武力掠夺他国财富与资源，抢夺殖民地，例如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侵吞、日本对朝鲜和清王朝的侵略战争等。^②而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在它们未独立前即已成为外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对象以及外国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其资源与财富大规模流出本国，业已形成的“核心—边缘”经济机制在独立后仍然起作用，资源已急剧恶化。M·P·托达罗在比较早期工业化和第三世界晚近现代化资源条件后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始其现代化增长时相比，一般缺乏丰富的自然资源。除了少数在世界性需求日增情况下有幸得到丰富的石油及其它矿产和原材料供给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亚洲国家，是十分缺乏自然资源的。^③如果考虑到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对世界资源的垄断优势，第三世界晚近现代化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就更严重了。仅根据70年代资料统计，北美和西欧买走了世界矿物燃料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金属矿产和钢铁的四分之三，有色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的五分之四，1975年北美和西欧消耗掉的能源多于世界总能源消耗量的一半。^④因此，欧美早期现代化的经典方式，即以资源的充分供给为基础，实行完全的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已不适合于第三世界的晚近现代化。资源配制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中心问题，因迟发展导致的资源制约迫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去寻找新的发展方式，使有限的资源达到配制最佳。例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即与资源配制问题有极大关系。

2) 由于自近代以后“核心—边缘”世界经济结构的逐步确立，国际资本积累由“核心”向“边缘”不断扩展。在早期现代化国家国际资本的强力作用下，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相当一部分积累流失国外。因此，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为加速自身民族的现代化，必须加快形成民族资本，加强国家的干预能力，这样，早期现代化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方式显然已经落伍。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看，现代化愈是晚近，所受制约愈大，因而国家政权的作用就愈显突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工业化过程中，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对新生工业的资金供给以及向它们提供较为集中和较高深的企业指导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就越是明显。^⑤如果说，英国、法国等是第一批开始现代化的国家，那么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和稍后的俄国等则是第二批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格申克隆比较英国、德国和俄国工业化资本积累后指出：英国是依靠分散的私人力量；德国依靠用投资银行部分代替“下

① 转引自P·肯尼迪：《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曹远征：《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达体系中的发达与不发达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③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④ P·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第403页。

⑤ S·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54页。

落不明”的私人资本家；俄国则以国家临时代替银行。因此，他认为欧洲工业发展表明：现代化的晚近和经济落后是国家作用越来越大的原因，不发达地区的落后程度是决定发生上述哪一种代替的主要因素。^① 作为第三批在二次大战以后才大规模独立地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来说，由于其现代化的晚近，其所受制约以乘数增加。^② 早期现代化国家的英国、法国开始现代化时，只是受到西班牙、荷兰等少数几个殖民国家的制约；而当德国、俄国、日本等后起国开始步入现代化时，不仅要受已现代化的国家制约，而且它们之间也充满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对于波及全球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晚近现代化来说，其所受制约显然就更大。自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逐步形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结构。而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率先突破中世纪的孤立结构，挟其军事优势，对亚非拉广大地区实行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侵略与统治，使自己置于世界体系支配与核心位置，占尽了现代化必须的资源与市场优势。正是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通过掠夺财富、剥削他族，一方面支撑和加速了自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扭曲并在许多方面阻碍了亚非拉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全球范围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与巨大势差，“核心一边缘”世界经济格局从而得以形成与确立，而殖民主义正是形成这个体系的手段和维持其运行生存的纽带。为克服这种“核心一边缘”国际经济格局对现代化进程的迟到者——第三世界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制约，国家的作用因此变得更为突出。此外，从国内环境看，由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晚近与外发性导致社会结构缺乏弹性，市场发育不完全，其作用也有限度，因此，国家在资本形成、发展战略、结构改革、基础设施、金融体系、文化教育等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第三世界多元发展道路的出现正是寻求发挥这一作用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加经典发展方式，还是社会主义方式，或是混合发展方式，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结合国情寻找新的发展途径、加强民族资本积累和成长、分解和抗拒国际资本压力并实行赶超的新探索。

3) 晚近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因果及制约关系。对此，摩尔 (B. Moore) 曾指出：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个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他认为，发展成为西方式民主的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以法西斯主义为归属的德、日等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导致共产主义的苏俄与中国革命这三种类型是一些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它们相互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没有英国较早的民主式现代化，很可能不会出现德国和日本等所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前两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共产主义纵然出现，其具体形式也会截然不同。印度的缺乏自信正是一种权衡利弊、对早先三种发展形式历史经验的批判性反思。^③ 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印证了摩尔的判断。从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发展道路无一不是采用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但自19世纪以后，其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灾难：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殖民地的瓜分和稍后法西斯主义盛行，导致了两次争夺资源与市场的世界大战；瘟疫一般的经济危机横扫全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古典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进行了修复与调整，另一方面本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根据本国国情走上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发展道路选择的多元性与独特性无一不反应了迟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还是伊斯兰发展方式，或是非洲社会主义实践虽各具特

① 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285页。

② D·森哈斯：《欧洲的经历——发展理论的历史评判》，多佛尔1985年版，第71页。

③ B·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色,但都或早或晚地否定了经典的“西化”和“苏化”模式,其共同特征都具有“巴里洛克”模式所倡导的发展理想的色彩,即:不发达国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历史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下重复这样的过程已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是理想的道路。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意味着重复现实状况的那些错误:浪费性的不合理消费,环境的加速退化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价值体系的后果。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西方对现存体制进行某些简单的修改,而是必须以建立一个同环境本质上相容的社会作为基础。^①

2. 社会动力系统结构及发生作用条件的差异

这是就第三世界各国现代化内部条件而言。关于社会动力机制,恩格斯曾经典型地表达如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②因此,我们应该在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历史运动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由于第三世界各国历史条件、内外环境因素(包括人口、资源、经济类型和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教育水平、国际地位的差异),特别是各个社会集团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瓦解、分化、组合情况不同,其社会形成的历史合力必然造成现代化不同的道路和模式,即使“相同的经济基础——按其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历史变异和程度差别。”^③因此,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具有多种可能性,没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发展道路形成取决于该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形成,从内因看是由现代化前该社会的特点与性质决定的。这点正如艾森斯塔德(S. Eisenstadt)所阐明:现代化前的社会状况与特点,极大影响了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到问题。他认为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化是从以下不同类型的社会开始的,西欧:发轫于有着兴盛都市的封建或专制国家;东欧:来自高度独裁而低等都市化的国家与社会;美国和英属自治领地:由殖民化和移民形成;拉丁美洲:较支离破碎的现代结构出自寡头政治的殖民征服社会;日本:起源于一个略具独特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起步于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帝制,即一种基于特殊类型的“文士—官僚”制度崩溃后的社会;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社会:始于殖民体系之内,其中一部分(尤其在亚洲)以原有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社会和完备的文化宗教传统为基础,而另一部分,(特别是在非洲)则主要建立在部落的结构与传统之上。^④可见,第三世界各国历史传统的千差万别,形成了各民族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组成因素(包括主导因素、基础因素以及其它因素)的差异,其社会动力系统的结构以及发生作用的条件,因此各不一样。例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其农业社会发展主要问题即土地关系变革有根本关系。进入近代以后,在从农业

① 陆象金:《发展: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④ S·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关卡上,因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崩溃而分解出来的大量阶级因素,它们的相互作用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正如摩尔所指出:“土地所有者阶级推行农业商品化的成败,孕育着异常的重要的政治结果。当地主阶级向市场生产转变,使商业影响渗透农村生活时,农民革命便一蹶不振。这种悖离革命的方向转换以若干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日本明治时代早期,激变中的地主阶级大部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作为括掠剩余产品的工具。在另一些重要场合,农业社会遭到破坏,有的是象英国那样,斩断农民同土地的联系;有的则象普鲁士那样,通过重建农奴制而强化这种联系。反之,如果地主阶级内部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劲有力的商品经济态势,革命运动就有可能演变和发展成为咄咄逼人的威迫力量。”^①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与形成正是后一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中东大部分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形成,则明显与其历史的两大遗产有关系。一是它们原大多为奥斯曼帝国属地,长期的军事封建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如下后果: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不发达;个人与国家联系纽带与自主性团体缺乏;身份取向的价值观压倒了市场取向的价值观;对代议制的陌生与怀疑;社会整合程度低等等。二是它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东各国社会的发展,无不渗透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它是“一个包括僧俗、总体的、一元化的生活方式;它是一整套信念和崇拜方式;它是一个广泛而又相互联系的法律体系;它是一种文化和文明;它是一种经济制度和一种政体和一种统治手段……”^②,所以尽管二战后中东各国相继迈入现代化进程,各种外来的道路、模式、思潮也相继涌现,但其尝试实践无一有较成功见效者,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专制主义等都是如此。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其他可选择的统治形式都已在这些国家试用,并且失败了,尤其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是如此。君主制、一党制、多党制、寡头制都实行过,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军界人士也试身其中,亦无成效,在某种情况下已自动撤回营地。非政界的专家治国者,同样一事无成。这种出于走投无路的再认识的结果使中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对曾经袭用的各种外来发展模式,包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他们自己的阿拉伯复兴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深感失望。于是,他们即转向包罗万象的、渗透于他们生活各方面的并植根于他们历史和现实之中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③其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外来模式缺乏在伊斯兰意识与传统深深浸润的社会土壤上长久植根生长的能力。目前,从总体上看,中东各国发展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伊斯兰社会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们之中都结合了伊斯兰传统的因素。中东各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表明,一个国家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也有可能是其现代化道路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这样说,物质条件决定其可以变,而文化传统决定怎样变。从其它第三世界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形成也可以看出,文化因素有重要作用。

黑非洲地区60年代独立后,大多数国家相继选择非洲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后,又趋向采用混合生产方式,这同样是其社会传统经济和文化制约的结果。独立之初,绝大部分非洲国家不可能选择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经典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不存在。由于受到当时国际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支持,加之殖民时代仍保存了较完整的传统社会村社制,因此被视为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非洲农业的传统形式是村社所有制形式,这个古老的基础能够用来建立独特的非洲型社会主义。

①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374页。

② C·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0页。

③ 参见詹姆斯·比尔:《波斯湾伊斯兰教的复兴》,载美国《外交季刊》1984年秋季号(转引自云南大学)。

非洲社会主义实践,在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实现民族整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构成了历史前进的一个环节。但非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改变自然经济以发展现代商品生产,而不是变更现代经济的所有制属性,因此它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生产方式道路。在不具备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后又转而发展私营经济;在80年代后则成为当代非洲发展道路的主要趋向。

就拉丁美洲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选择而言,其历史传统遗产——数百年殖民地社会——则成为主要因素。从经济发展来看,其资本主义无不是在殖民地社会土壤中成长出来,其工业化是面对世界外向型经济如原材料加工和外来资本投资的结果,其现代农业资本主义或是奴隶种植园演变而成,或是封建大庄园的过渡,或是欧洲移民垦植而成,或是对土著印第安人大规模驱赶、屠杀而侵占其土地所致。至于它的文化发展,由于共同宗主国的亲族关系而与西欧的联系密不可分,无论是在意识形态、宗教、教育、语言还是在文学、艺术、乃至习俗等方面都是如此。

3. 多元多样性的统一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从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形态演进的高度看,多元多样性的统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所谓多元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同一时空里多种社会形态及模式的共存关系。从生产方式的演进来看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是由低级向高级依次上升,但这只是就社会形态演进的整体性而言,以下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决定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多元性。

1) 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是在并存与交替中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刀两断,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生于16世纪,从这以后至19世纪后才真正占据统治地位。在近300多年间,资本主义早期的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和世俗化与封建主义的衰落、改革、挣扎交织在一起。欧洲现代化的最初进程首先是由西北欧强有力的专制君主开始的,如英国的都铎王朝、瑞典的瓦萨王朝,或由城市贵族发起的如荷兰等。晚至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这个巨人也仅在西北欧和美国才显示出轮廓。直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才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在中欧继之在东欧掀起,其中包括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的改革、普鲁士容克的资产阶级化与以铁血统一德国、沙皇俄国1861年开始的农奴制改革。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现代化才从欧美中心向边缘推进,在中东、东亚和拉美部分地区激起反响。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还远未完成,就产生了比其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了人类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同样,这种过渡又带有以往社会的多种痕迹。

2)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由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明程度的差异,社会形态的演进因而具有不同步性,这也是社会形态多元多样性统一存在的原因。它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某一社会形态的发展将引起其他社会形态的变异,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率先发展,即造成了边缘地区社会形态变异性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以至19世纪在全世界统治地位的确立打断了边缘地区社会的正常进化,造成了后者的变异性发展:在中东与东亚是殖民封建制,在拉美是嫁接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与农奴制,在黑非洲是殖民制度下的部落氏族制。^①与欧美核心地区不同的是,边缘地区的资本主

^① 参见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义并未代替前资本主义而是与之混合生长：“欧洲边疆转移的结果几乎总是形成一种杂交经济，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古老的结构和平共处其中。”^① 这点印证了卢森堡19世纪下半叶在《资本原始积累》一书中的论断，即资本主义发展是要以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为条件的。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社会形态发展的相互作用、渗透、斗争、碰撞和融合可产生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二次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双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古典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加强国家干预实行福利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打破无所不包的国家所有制，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了空前广泛的改革运动。毫无疑问，当代第三世界混合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寻找新的发展方式，正是上述两种社会发展形态相互斗争与融合的结果。

3)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演进的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预定了有这样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就曾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理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第三世界近现代历史表明了这种社会形态发展顺序上的特殊性，或者说社会形态超越性即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作过很有预见性的理论概括。其前提包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存在，落后国家能否吸收其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等“积极成果”。他们认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应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② 中国等一批第三世界国家越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余树声：《历史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章。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